

红砖红瓦的房子

□陈占敏

从我们老家烟台招远的那个小村唯一的西大街往西走，出了村子向北，走向那条河东岸的大道，走二里路，就到中村了。中村是河两岸上上下下四五十里以内最大的村子，过去是个古镇，有一条别的村子全都没有的最长的大街。穿过那条大街，沿了一条南北胡同向北走，一直走到村子北头，就看见一所红砖红瓦的房子了，那就是供销社了。好多年里，那么大的村子红砖红瓦的房子就那么一所，像一个标志，那就是文明和繁华的所在。

那些年里，上中村就是现在的上深圳。中村人比现在的深圳人还要骄傲。中村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，可是中村人还愿意对人说他们是中村镇的，他们的洋洋自得令人发笑令人嫉妒，也令人隐隐地羡慕。中村的业余剧团出村演戏，他们挂起来的幕布上就赫然绣着“中村镇”这样的大字。我想，这正是因为他们村子的北头有一所红砖红瓦的房子，那所房子，多年来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卖日用百货的地方。

小时候家里还不需要我去买油盐酱醋，可是我也愿意上中村。上中村其实也就是上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去，在柜台的外面，从房子西头走到房子东头，看摆在货架子上的那些茶缸、瓷盆、牙膏、牙刷、衣袜鞋帽、钢笔小刀，看过来看过去，一样东西也不买，两手空空地走出来。因为有了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，那里也就有了别处没有的繁荣景象。

有一年上中村变得十分困难了，河东岸的那条大道上设了关卡，立了黑板，黑板上写了字，小学生拿着小棍，指了指黑板让人识字，把字识下才放入过去。那是大跃进的时候，扫盲识字像大炼钢铁一样突飞猛进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，我被关卡上比我先上了两年学的小学生挡住，通不过去。我被他们逼着识字。他们得意的样子像中村人宣称他们是“中村镇”的一样令人嫉妒，也令人羡慕。那时候我开始懂得了，原来文化也能欺负人。

到了我上学读书，大道上的关卡就没有了，我就是有了欺负人的本事能把别人挡住，逼人识字，我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。这时候我上中村，往往是确实要买东西，比如买一个本子、一支铅笔、一块橡皮，都能成为我上中村的理由。在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，我把二毛钱交给售货员，她给我两支最不好的铅笔，就是木杆上连油色也没有的那一种。好多年，售货员都是铁着脸的那个女人，她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笑过。她似乎特别不愿意把东西卖给小学生，小学生叫她拿铅笔拿本子，她总是把铅笔本子扔到柜台上。在那所房子东头卖布的女售货员，是态度最好的一个，她长得也很美，有一双美丽的眼睛，她一笑就露出了雪白的牙齿。她一直在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卖布。我不知道供销社的领导叫她在那里卖布，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丽。

那些年上中村，就怕“关板儿”。有时候放了学，太阳就快

落了，气喘吁吁地往那儿跑，跑到中村北头，远远地看着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，大门已经关上，玻璃窗上也挡上了木板——人家还是“关板儿”了。不甘心就这样回去，趴到门上，从门缝往里看，叫，央求人家开门。人家说关板儿了关板儿了，硬是不肯给“开板儿”。转到东面的那个大门外边，盼望着那个卖布的售货员会把门打开。她既然会对人笑出那样雪白的牙齿，她就不应该不理睬人的央求。可是仍然不“开板儿”，房子里头没有声息。

从前面的门叫不开，就转到后面去。后面是一个院子，院子很大，垛了一些货物，铁锅和大缸就那样放在露天里，院子的大门还没有关，可是却不敢进去。看见售货员去食堂领饭了，就更不敢开口叫他们“开板儿”了。男的女的售货员都拿着搪瓷的大碗，大碗里放了小勺，有的把小勺捏在手上敲打着铁碗，敲出又悠闲又自在的叮当响声。他们居然都不使用筷子，他们连吃面条都使用小勺，他们用小勺挖了一块咸菜，咬一口再放回碗里。

在这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工作的人原来是这样吃饭的！他们才真正令人羡慕，不像中村人似的只能说一句“中村镇”的空空的大话。我在对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的向往里，从此增添了新的内容，我渴望着有一天，也拿着一个搪瓷的大碗走进集体的食堂，用小勺吃饭，不再使用筷子。这种向往日久愈深，直到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拆掉，盖起了更大的房子，抹

了灰色的水泥大墙，我的向往仍然没有消失。

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是彻底地消失了，后来盖起的更大的房子也没有了踪影，原来的那个地方盖起了三层的楼房。我没有看见供销社在大楼开业时剪裁的热闹闹的仪式，等到我去年腊月上中村赶集，走到那个大楼跟前，那里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与供销社大楼紧挨着的大小商店难以计数，西面不远的市场上人声喧闹。走上冷冷清清的楼梯，走过供销社大楼卖货的一楼二楼和三楼，层层都是售货员比顾客多。售货员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好，买一把指甲剪都有两个人走过来为你服务。我想起那些年的腊月集日，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，人挤得走不动，售货员需要不断地提醒大家，别挤倒柜台，别挤倒柜台！其实那时候的柜台是砖砌了底座，结实得很。

过去了寒冷的冬季，听说中村供销社的大楼卖给了私人，职工全部下岗，保留工职，到时候给办退休。作出这个决定的供销社主任是个女人。她肯定不是在那所红砖瓦的房子里卖布的那个女售货员。那个女售货员早该退休了，不会再美丽了，不会再对人笑出雪白的牙齿了。

中村，成了一级政府的所在地，改成了镇，但不叫中村镇，叫金岭镇。中村人，不再会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“中村镇”了吧？

初秋的一天，我走近了这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的洋关建筑群。金黄的夕阳照耀着烟台山东西领事路之间的南山坡中央地段，自东向西排列着副税务司官邸、税务司官邸、发讯台、发讯塔、高级职员公寓。

西去数步便是税务司官邸，这是几段矮墙围起的独门庭院，院内树木葱茏、花香草美、涛声回荡。官邸是青砖砌成的单层建筑，但房体高大，四周全部建有宽大原外廊，气势恢宏。

离此不远是三层高级职员公寓，这是座欧式造型的三层楼房，结构精美，青砖明线墙体，红色砖牙腰线，洁白的双开推拉式窗户，一派欧式古典建筑的韵味，宛如一座欧式古堡耸立在烟台山

翻读洋关

□郭锐

上。

可以说，当年洋关的这组建筑是在烟台最美的地方建起的最美的建筑，几近一个半世纪的风吹雨打似乎没有损坏它的容貌。然而，当我们拂去时代的尘埃，翻读洋关的历史，我们会深切地感到美丽的洋关是国人屈辱的见证，是一块让人心痛的伤疤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根据不平等的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，清政府被迫答应开辟登州做通商口岸。1861年，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开始对登州、烟台等地进行考察，这是一个颇有心计和知识的家伙，他考察得出的结论是，烟台港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登州，建议英国公使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。英国公使采纳了马礼逊的意见，并强行要求清政府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，软弱的清政府被迫答应。1861年，在恭亲王奕訢奏请下，咸丰皇帝下旨，烟台口岸对外开埠通商，并将登莱青道由莱州迁往烟台，同时，筹建海关监督衙门，俗称“常关”。

1862年3月，东海关监督衙门正式开关办公，辖山东5府、16州县、23海口。列强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，事过一年，攫取中国海关最高权力的代理总税务司赫德，下令在烟台建立东海关税务司署，并派英国人汉南担任东海关首任税务司，“洋关”即此产生。汉南是个精通业务又野心勃勃的人。上任伊始，即在烟台山下购地建造东海关税务司公署办公楼，其后又陆续在烟台山上建起了豪华的税务司官邸、副税务司官邸和高级职员公寓、发讯房、发讯台等一系列建筑。

当时，烟台是一个繁荣的港口，西方从这里进口鸦片、洋油、洋火、洋布、洋铁等货物，中国则从这里出口草编、针织花边、花生、粉丝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工艺品。烟台港和内地的来往也十分频繁，港口内常常是桅杆如林，货积如山，关税银两也如潮涌来。自东海关建立至1895年，洋关每年征收关税总额20万-30万两，20世纪初叶，增至60万-70万两。自1901年，为抵押庚子贷款，洋关更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，烟台两侧25公里的八角等海口被列入洋关的征收范围。1931年后，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，以荣成石岛为界，沿海岸线向西，至黄河入海口，全部由洋关征税。

洋关税务司从英国人汉南开始，继而是英国人卢逊、好博逊、美国人杜德维、德国人德翠林、法国人伯罗德……后来又又被日本人强占。税务司走马灯一样换着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。不但税务司、副税务司是洋人，所有高级职员也都是外国人。这些洋员们白天在税务司公署大把大把地征收白银，夜晚回到官邸和公寓，逍遥享乐，享受着种种特权。这是一段多么令人心痛心酸的历史！

黄昏中，烟台山上的洋关建筑群是安静而优雅的，永远没有了税务司“叫班”的声音，也没有了洋员们围坐在壁炉旁举杯相碰的闲雅，但它承载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沉重的记忆。

从烟台山上下，漫步约10分钟，就来到了当年的东海关税务司公署，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，红瓦坡顶，西式门窗。楼下为东海关税务司公署验货征收处，楼上为税务司、检察长和高级职员的办公室。当我走进二楼的一间宽大的房间时，海关人员告诉我，这就是当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不平等的中英《烟台条约》的地方，这又是一块令中国人心痛的历史。

走出税务司公署，已是暮色苍茫，回望这座洋关，似乎显得更加凝重和森严。翻读这段洋关的历史，让人悲怆和压抑，但它让人明白和记住了“弱国无外交”和“国贫受辱”的道理。



▲ 烟台月亮湾景区。

港城的项链

□王月鹏

到过烟台的人，大抵是不会错过滨海景区的。这是港城烟台一条美丽的项链。

滨海景观带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广场群、高层商务区……漫步滨海景区，你会同时体味到自然与人文，古朴与现代。被海浪冲洗去了的，不仅是岁月的风尘，还有你的疲惫或忧思。

曾经见过一幅老照片：刀削一样干净利落的街面，一排笔直的树立在中间，两侧是零星的楼房，不高，但很庄重。车辆像饰品一样点缀着街面。没有广告牌，没有霓虹灯，甚至没有太多的行人。仅仅是一条街，一条单线式的、并不宽阔的街道。在它的上空若有若无地漾着海的气息。

这幅照片所保存下来的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烟台。它简单得令人珍视，简洁得让人心安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这座城市也已容颜改变，甚至让人不敢相认了。

在我的心中，这个滨海城市是随意的，也是性情的。我相信，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也会像我一样淡忘了它的存在，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但是，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，这个城市都给你准备好了相应的理由。

海是不可解释的。可以感受，可以想象，唯独不可解释。栈桥深深地懂得这些。

沿着滨海路海岸线蜿蜒前行，落日在天交接处静静地浮着。栈桥依旧，沿着暗色的栈桥，我走向更深的暗色。那是力量的源泉，是让一个人身心宁静的地方。我喜欢栈桥，喜欢它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这让我一次次地走向它。独立栈桥，迎着海风，我不知道是海水充盈着沉默，还是沉默充盈着海水。夕阳已经沉没，海的余温让人心动，让人想象晨曦是怎样再次托起这个城市。

城市淡远了。烟台山与海相依相偎。没有了想象，只剩下海，

一波波的海水簇拥着栈桥，包围了我。我说不清自己，就像看不清这海一样。生活有很多可能，我还会有一样的可能？

栈桥附近，有一个叫做月亮湾的地方。那是一片弯月形海湾，一道宽约一米、长二十余米的海堤，静静地探进了海里。这是我心中的另一道栈桥。在它的尽头，是一座不锈钢制的月亮老人雕塑。这里成了青年人谈情说爱、海誓山盟的地方。

这片弯月形的海湾，与冰心老人的童年紧密相连。上个世纪初，月亮湾南面的山坡上是一座清朝海军的训练场，它隶属于烟台海军学堂，校长是一位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，叫谢葆璋，福建人，1903年偕妻子和3岁的女儿来烟台创办了这所海军学堂，全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。他的女儿时常独自一人来到月亮湾，听着生生不息的涛声，看着由远而近的一排排浪花，静

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。

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。营房、旗台、炮台、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，成为她童年时期的活动舞台。后来，她在《忆烟台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“一提起烟台，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……但是，关于烟台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我童年时代的烟台，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，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。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，它朝气蓬勃、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接五洲四海的客人。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，在它的角海滩上，徘徊踟蹰，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。”

潮起潮落。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，来到滨海景区，来到这个被誉为“城市会客厅”的地方，漫步，远眺，想一些什么事情，或者什么都不去想，只是静静地走着。在这里，海是懂你的。